

· 专题研究 ·

英国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的政治意蕴

张殿清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英国都铎宫廷饮食、服饰消费不仅是维持宫廷人员生存的必要条件, 还是彰显国王权威、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为此, 国王倾其财力维持炫耀式消费, 饮食、服饰尽显奢华。然而, 由于受国王自理传统的束缚以及议会的制约, 国王只能依靠其可支配性收入, 不能通过税收的方法来筹集饮食、服饰消费资金。这充分体现了都铎王权的有限性。

关键词: 都铎宫廷; 饮食消费; 服饰消费; 炫耀式消费

炫耀式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是一群体显示其比另一群体高贵的一种策略。近代以前, 处于等级社会顶端的国王, 需要通过炫耀式消费彰显其独一无二的高贵地位, 在此意义上讲, 该种消费方式是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都铎王朝 (1485- 1604年) 是英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 这时期的国王利用人民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 加强了王权。为了炫耀国王权威、招抚地方贵族, 宫廷的仪式和宴会增多, 使饮食、服饰、建筑¹等炫耀式消费增长。但这种消费并没有突破国王财政自理 (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的传统, 而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宫廷消费²不仅是王权的外在体现, 还标志

收稿日期: 2010- 01- 19

基金项目: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HB08BLS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08JC770011)

作者简介: 张殿清, 历史学博士,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国经济社会史。

¹ 都铎宫廷不仅是君主及其家庭成员的居住场所, 还是政府管理机构。这一功能决定宫廷消费主体既包括国王及其家庭成员, 还包括参与国家事务的官员、寻求国王庇护的贵族和宫内各类服务人员。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主要体现在饮食、服式和建筑消费等方面。因笔者曾撰文探讨都铎宫廷建筑消费, 故不在此文赘述, 详见拙文《英国都铎王朝宫廷建筑消费的一项实证考察——兼与16世纪中国比较》, 《历史教学》(高教版), 2007年第12期。

² 多数学者将“宫廷 (Court)”等同于“王室 (Royal Household)”。兰德 (J. R. Lander) 认为“宫廷或者王室是政治生活的中心”; 劳蒂斯 (David Loades) 认为“王室或者宫廷是各种政治生活的焦点”; 布朗 (A. L. Brown) 在谈到中世纪末期的王室时, 也认为“王室或者宫廷是用来表示王国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社会中心的最恰当词语”。但有些学者将王室视为宫廷内部的一个机构, 理查德·布林纳尔 (Richard Brimell) 和迪兹 (F. C. Dietz) 就持此观点。另外, 还有学者认为宫廷是王室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威尔纳·桑巴特认为, “英国宫廷直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才得以建立”, 在他看来, 都铎国王的居住地只能被称为王室, 而不是宫廷。实质上, 无论王室还是宫廷都是后来学者对历史上以国王个人为中心的政治机构的一种命名, 两者之间的含义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 本文认为王室等同于宫廷。参见 J. R. Lander,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England, 1450- 150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8; David Loades, *Powers in Tudor Engl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40; A. L. Brown, *The Governance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1272- 146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8; Richard Brimell, *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 28; F.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558- 1641*,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64 [德] 维尔纳·桑巴特著, 王燕平、侯小河译: 《奢侈与资本主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页。

着王权控制财政的能力,通过对其考察可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都铎王权的特征。

一 作为生存必要条件的饮食同时也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标记,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不同社会阶层享有不同的饮食结构和消费规模。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在王室饮食上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饮食结构、消费规模符合国王的身份。

该时期,贵族享用小麦制作的白面包是其社会上层身份的一种象征。作为全国最大的贵族家庭,王室所需要的小麦都是通过国王的特权——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¹在全国各地征买的上等小麦。这些小麦在王室的仓库中被清洗干净、在磨房磨成面粉,然后被送到面包房,由面包师烤成面包。而且,国王和王后有自己的御用面包房,雇专人为其特制面包。亨利八世时期,宫廷上层人员每天食用700个优质白面包,普通服务人员食用250条总重量为725公斤的普通面包和黑面包。²数量惊人。

肉类是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贵族餐桌上的主要食品,日常肉食消费量也是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展示王家气派,宫廷菜肴主要以肉食为主,并且种类丰富。例如“王室库长(M r T reas ure)首餐有10个肉菜,第二餐有六个肉菜,普通保管员(cofferer)每餐有7个肉菜,他的佣人可以享受每餐3个肉菜的待遇。王室储计库书记员每餐7个肉菜,下属人员每餐3个肉菜。主管会计(Clerk Com p r oller),每餐7个肉菜,下属人员每餐3个肉菜。在储计库工作的约曼和未婚侍卫的饮食待遇相同,每餐三个肉菜。”因而,宫廷肉食消费量巨大。1554年,王室每天要消费80-100只羊、12头小肥牛、18头小牛犊,还有大量的禽肉、鹿肉、兔肉和野猪肉。^{3 4} 即使在对宫廷饮食消费控制比较严格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室每年也要消费1240头牛、8200只绵羊、2330只鹿、760只小牛、1870只猪、53只野猪。^{5 6}

葡萄酒被认为是贵族饮料。都铎宫廷消耗的所有葡萄酒全部从欧洲大陆进口,价格昂贵。“宫廷每年大约消费300桶,一桶葡萄酒大约在105-205加仑之间,消费量很高。仅国王个人享用的葡萄酒就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例如,1526年,亨利八世自己就消费了价值700镑的红酒,1528年消费了价值844镑的波尔图葡萄酒”。⁷ 即使素称节俭的伊丽莎白一世,其在1574年的葡萄酒开支竟然也高达2951镑。⁸ 葡萄酒是王室成员和贵族饮品,宫廷一般服务人员则饮淡啤酒(ale)。因宫廷服务人员数量较多,所以淡啤酒消耗量远远大于葡萄酒。据记载,都铎王朝每年消费600000加仑的淡啤酒。⁹ 如此大量的啤酒消费,自然消耗王室部分钱财。1574年,王室啤酒开支为5596镑。¹⁰

重大节日、外交会晤、庆典等公共活动是都铎国王向其臣民和外国展示威严的重要时机,因此在饮食上,必求精良,花费巨大。复活节、升天节、圣诞节以及王室主要成员的婚礼、葬礼和加冕典礼等节日的饮食开支高涨,一般而言,是日常的2倍甚至3倍。

亨利七世加冕时,为了显示国王的恩典,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宫道路两旁都摆满美酒,供路人免费饮用。1493年的圣诞节,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宫宴请伦敦市长及其随从,宴会上,饮食精美、数量

¹ 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是指王室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王室的日用品、征用民众的运输工具以及征调民众为王室廉价服务的一项特权。利用这项特权,王室购买物品的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低1/3至1/2。最初,伙食征发与劳役权是为了满足国王的军事需要而设,在14世纪早期演变为满足王室的日常需要,成为国王低价获取生活日用品的一项特权。“Purveyance”一词国内有不同译法。马克垚、刘新成将其翻译为“王室强买制”,顾奎斋翻译为“伙食征发优先权”,侯建新翻译为“伙食征发与劳役权”。由于这种特权不仅可以使王室低价获得日常供应,国王还可以借此征用劳役,例如,爱德华三世就曾征发数百人修建王宫,所以本文采用“伙食征发与劳役权”的译法。

²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1, p. 70.

³ David Loades, *Chronicle of Tudor Queen*, Stroud: Sutton, 2002, pp. 179-180.

⁴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New Jersey: Bame & Noble Books, 1987, p. 222.

⁵ Simon Thurley, *The Royal Places of Tudor England: Architecture and Court Life 1460-154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0.

⁶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160.

⁷ Simon Thurley, *The Royal Places of Tudor England: Architecture and Court Life 1460-1547*, p. 62.

⁸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70.

⁹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558-1641*, p. 417.

¹⁰ Simon Thurley, *The Royal Places of Tudor England - Architecture and Court Life 1460-1547*, p. 158.

¹¹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558-1641*, p. 417.

丰富。国王和王后所用的餐桌上摆满 60道菜,伦敦市长和随从的餐桌上也摆放着 24道菜。¹

亨利八世在节日时,经常邀请贵族、高级官员共同用餐。邀请的客人经常超过 700人,需要同时供应 240道菜。即使邀请客人数量相对较少时,饭菜供应也很多。一次,亨利八世在温莎宫招待 30名宾客,就供应了 14道肉菜,800个鸡蛋,90盘黄油,80个栗子面包和 300个薄饼,还有姜饼,充足的水果和大量酒饮料。²

1520年,为了亨利八世与法兰西一世在加莱会晤,英国王室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与生活用品,其中包括 2200只羊、1300只母鸡、800头小牛、340头菜牛、312只鹭、13只鹅、17头鹿、9000条欧鳎鱼、700条鳗鱼、7000条鲑鱼、4蒲式耳芥子酱,堆积如山的白糖以及为国王做蛋糕用的奶油,这些食物总价值为 8839镑;还有价值 7409镑的葡萄酒和啤酒,440镑的香料和大量的面包以及价值 377镑的炊具。”

都铎宫廷的饮食消费规模还可以通过饮食机构工作人员的数量得到体现。兰德斯的研究显示,“1540年饮食机构的总人数为 230人,亨利八世晚期为 245人,玛丽时期为 270人,1560年为 270人,1600年为 250人”。³该时期,虽然贵族们也追求炫耀式饮食消费,但无法与宫廷相提并论。第五代北安波哈德(north-umberhard)公爵是追求炫耀式消费的贵族典型。虽然其家每年消费 16 392蒲式耳小麦,27 594加仑淡啤酒,1646加仑葡萄酒,124头猪,667只羊,14 000条鲑鱼,⁴但与宫廷比较则相形见绌。可见无论从结构还是规模上,都铎宫廷饮食消费远远超过贵族,达到了显示国王身份的目的。

尽管每位国王都有维持庞大饮食消费规模的欲望,但他们受王室可支配性收入的制约,因此都铎时期宫廷饮食消费数量是动态变化的。亨利七世时期,饮食消费每年固定在 11 000-16 000镑之间。例如,1497年-1498年,每周饭费为 200-250镑,圣诞节期间的消费最高为 580镑,⁵全年不超过 15 000镑。亨利八世前期,王室人数增加,饮食开支随之增加。据统计,1518-1527年,王室饮食消费在每年 20 000镑之上。⁶亨利八世前期饮食消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518-1527年王室基本食物和饮料消费表

年份	小麦 (夸脱)	燕麦 (夸脱)	酒 (吨)	啤酒 (吨)	牛肉 (头)	猪肉 (头)	总价值 (镑)
1518-1519	2640	3749	301	1249	1421	7650	20 378
1520-1521	2952	2489	342	1393	1470	8323	21 568
1521-1522	2897	3506	317	1401	1467	7751	21 666
1526-1527	2928	3482	277	1405	1343	7666	20 254

亨利八世后期,饮食开支上涨,但由于缺乏详细史料,无法得知精确数据。

玛丽时期,每年餐桌花费为 300 000达克特金币。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为了减少宫廷饮食开支,采取停止供应早餐、改变允许官员将食物带出宫廷的惯例等有损王家形象的政策。这使宫廷饮食消费较之亨利八世时期大幅下降。1576年的饮食开销为 6000镑,1583年为 10 000-12 000镑之间。⁸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该时期宫廷实际饮食消费支出应该远远低于都铎初期。据统计,1500-1550年,物价

¹ Bryan Bevan *Henry VII: the First Tudor King*, London: the Rubicon Press, 2000, p. 46.

²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78.

³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222.

⁴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65.

⁵ Maurice Keen, *English Society in Later Middle Ages 1348-1500*,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168.

⁶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74.

⁷ Richard Britnell *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 Blackwell, 1997, p. 70.

⁸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967, p. 207.

⁹ Christopher Haigh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George & Geor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8.

指数由 100 涨到 105, 1550–1600 则从 105 涨到 199¹。16 世纪末期的物价是亨利八世时期的 2 倍, 如果按此比例估算, 1583 年的饮食开支只相当于都铎初期的 5000–6000 镑。

由上述可知, 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时期, 宫廷饮食消费数量呈现逐渐增长趋势, 其后饮食消费开支减少。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的宫廷饮食消费的实际开支远远低于其祖父亨利七世时期。

二 服饰也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作为物质文化, 它具有防寒、遮羞、美饰等实用功能; 另一方面, 它又属于精神文化范畴, 是意识形态的外化, 反映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由于社会下层群体有模仿上层群体服饰的倾向, 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 都铎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 (Sumpture Laws),² 详细规定各阶层服饰的材料质地和款式, 违反者要被处以罚金。由于这些法令实质上强化了服饰与社会身份的等同关系, 不仅未能禁止出身卑微者侵犯高贵者的服饰特权, 富裕平民穿戴贵族服饰的现象屡禁不止, 而且, 越发刺激贵族在服饰消费方面的竞相攀比。那么, 为凸显国王的至尊地位, 宫廷必然在服饰消费上追求奢华, 以超越贵族, 这就使服饰消费成为宫廷的一项重要支出。

宫廷的服饰消费, 既包括国王及其家庭成员的服饰费用, 也包括宫廷服务人员和约曼卫兵的制服费用。国王及其亲属的服饰开支不菲。据米兰大使记载, “亨利七世穿着华丽的衣服, 衣领上缀满了玉石和珍珠, 帽子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珍珠。”³ 又据威尼斯大使记载, “国王穿着镶着金边的彩色天鹅绒外罩, 衣领上缀满珠宝, 帽子上镶嵌着硕大的钻石和宝石”。⁴ 从两位大使的记载来看, 亨利七世的穿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八世的服饰花费也很高。他的一双鞋就价值 18 便士 (相当于现在的 22.50 英镑)、一顶帽子为 15 先令 (相当于现在的 225 英镑)。他一年的服装费用可高达 8000 镑。⁵ 伊丽莎白一世为了提升形象, 也用昂贵的服饰来装饰自己。她几乎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 她死时留下了 2000 套服装。⁶ 国王及其亲属的服饰及原料一般从国外进口, 价格昂贵。一码纯天鹅绒的价格就为 4 镑 1 先令 8 便士, 一码锦缎为 8 先令, 每码金织布料高达 2170 镑。⁷

宫廷还要为工作人员提供服装。一般而言, 宫廷每年要为所有服务人员提供两套镶嵌着都铎家族徽的红色、绿色或白色的制服, 一套用于冬天, 另一套用于夏天。约曼卫兵除了担负保护国王的安全, 在重大仪式时, 还肩负着展示王家形象的重任, 所以约曼卫兵的服饰比一般工作人员花费要高。他们的制服是镶嵌白色条纹的绿色天鹅绒紧身上衣 (tunic), 上衣的前胸印有金色或银色的都铎家族族徽。每个约曼卫兵每年发放三套服装, 一套比较贵重, 在重大节日、庆典时穿着; 一套价格比较便宜, 为普通穿着; 另外一套制服在晚间穿着。在亨利八世时期, 还有另外一种武装组织——绅士护卫队 (Gentlemen Pensioners), 因其成员都是绅士, 宫廷需为其提供质量更上乘的服装。

举行盛大仪式时, 服饰的花费更巨大。为了显示国王的乐施好善, 所有参加者都要被赏赐服饰用品。亨利八世葬礼上的布料赏赐情况如下: “赏赐每位伯爵 16 码布料; 赏赐伯爵的 12 名佣人, 每人 3 码。赏赐每位子爵 10 码; 赏赐子爵的 8 个佣人, 每人 3 码。此外每个人的马匹装饰还需要布料。赏赐伦敦市长和郡长每人 9 码, 大法官 10 码。上述人员的 8 个佣人, 每人 3 码。王室所有人员, 都要穿黑色的衣服。看门的狗也需要 4 码黑布料。国王的丑星和画师, 每人 7 码。”⁸ 据不完全统计, 亨利八世的葬礼共消耗“200 码白羊毛布, 200 码绿色布, 900 码丝布 (ray cloth), 641 码深红色布料, 2000 码红布, 88 码白布, 33 000 码黑色布, 8085 码黑色棉布, 99 码黑色克尔赛呢绒布。总计花费 12 000 镑”。⁹ 1553

¹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558–1641*, p. 399.

² 都铎时期, 议会分别在 1510、1514、1515、1533、1554 年颁布抑奢法。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枢密院多次颁布了公告, 规范社会等级服饰标准。详见 J. R. Riley, *The Tudor Age*,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1999, pp. 186–195.

³ Bryan Bevan, *Henry VII: the First Tudor King*, London: the Rubicon Press, 2000, p. 45.

⁴ Bryan Bevan, *Henry VII: the First Tudor King*, p. 45.

⁵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182.

⁶ 宋瑞芝主编:《外国宫廷文化集观》,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版, 第 413 页。

⁷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185.

⁸ Loach Jennifers, “The Function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Past and Present*, 1994 (2): 67.

⁹ Loach Jennifers, “The Function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Past and Present*, 1994 (2): 142.

年,因爱德华六世的葬礼,王室共购买 9400码黑布,耗资 4000镑。¹ 赏赐使服饰消费大量增加。

珠宝也是显示身份的必备品,所以国王们都斥巨资购买。“亨利七世从 1491年 12月 24日至其逝世,一共花费了 128 441镑购买珠宝”。² 伊丽莎白一世也非常热衷购买珠宝,据威尼斯密使估计,她的珠宝和装饰品的价值为 6 000 000 克朗 (crowns)。”而且宫廷还设有专门机构——珠宝房 (Jewel House)来负责保管国王的珠宝。

锦衣库是负责购买宫廷所需服饰的机构,通过它的账目可以反映都铎宫廷服饰消费规模和趋势。³ 亨利七世时期,根据议会法令,财务署每年应拨付大锦衣库 2105镑经费。⁴ 锦衣库的开支每年大约为 1300镑,用来提供男仆的制服费,婚礼、葬礼及宴会的服装费。⁵ 1510年,财务署拨款涨到 2015镑,1513年为 4015镑,亨利八世晚期锦衣库开支每年大约为 8000镑。爱德华六世时期降到每年 4000镑。⁶ 玛丽初期,由于加冕典礼和婚礼服饰等原因,锦衣库支出增加。其统治的最初两年内,锦衣库开支总计为 18 000镑,平均每年 9000镑。玛丽晚期,锦衣库开支降为每年 6000镑。⁷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锦衣库的支出在 10 000– 20 000镑之间,正常年景大约为 13 000镑。在其统治的最后 15年内,锦衣库的开支基本保持不变。⁸ 从数字上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锦衣库的支出达到最高值,超过了其父统治时期,但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会得出不同结论。如果按照 16世纪末期的物价是亨利八世时期物价的 2倍估算,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锦衣库的开支 (13 000镑)实际相当于亨利八世时期的 6500镑,可见此时锦衣库的开支实际上降低了。

尽管缺乏都铎宫廷饮食、服饰消费的完整账目,但通过本文前两部分所述史实,可以勾勒出这些消费的变化趋势:亨利七世到亨利八世时期为上升阶段,亨利八世去世后为下降阶段。前期宫廷消费高于后期,这与其他王朝初期的宫廷消费比较节俭而到中后期则奢侈无度的发展轨迹有很大不同。“统治者的恣意与贪婪是本能的、普遍的”,⁹ 英国君主并不比其他国家君主更洁身自好、更体恤民情。亨利七世在刚刚摆脱“糊口政府”(hand-to-mouth)的困境后,就开始购买珠宝、金制衣服,并着手修建王宫。当“节约”的气氛充斥整个宫廷的时候,¹⁰ 伊丽莎白一世个人的菜肴却在增加,女王宫廷乐师的数目也在增加。那么,是何原因导致都铎宫廷消费与其他王朝呈现不同特征?这与国王财政自理传统和强有力的议会有着密切关系。

国王财政自理是中世纪英国的一个传统。它指拥有王室领地的国王应该主要靠自己的领地收入和作为封君特权收入维持王室和王室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收入传统上无可争议地属于国王所有,国王对其享有征收和支配权。依照这一原则,宫廷饮食、服饰消费属于王室正常消费,应受王室可支配性收入的限制。国王没有要求臣民为宫廷消费承担费用的权力。

事实上,都铎王室可支配性收入的变化与宫廷消费趋势大致相同。都铎首君亨利七世努力追求财政独立,避免过度依靠议会,将封建法授予国王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不遗余力地扩展王室可支配性收入。在其统治期间,这些收入呈增长之势。从 1485年至 1490年,亨利七世的年均收入为 52 000镑。

¹ Loach Jennifers “The Function in the Reign of Henry V III”, *Past and Present*, 1994(2): 68.

²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Government Finance 1485–1558*, p. 85 另据特纳估计“1491–1509亨利七世花费 200 000–300 000磅购买珠宝,也许还有相当多的礼物赏赐给贵族、群臣”。J.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p. 217.

³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Government Finance 1485–1558*, p. 110.

⁴ 需指出的是,有时君主个人的服饰也由其他宫廷机构负责,花费不在锦衣库账目上显示。

⁵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74

⁶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81.

⁷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p. 81–82.

⁸ David Loades *Tudor Court*, p. 82

⁹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558–1641*, p. 399–401.

¹⁰ 侯建新:《让历史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从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1页。

¹¹ Christopher Hagh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9.

其统治后期的年均收入增加到 113 000 镑。¹

亨利八世初期,王室领地等收入虽有所减少,但亨利七世留下的遗产仍可使维持其奢华的消费。当遗产消耗殆尽后,亨利八世开始通过宗教改革,没收大量宗教界地产的方式增加王室领地。据统计,从 1538 年到 1540 年,亨利八世总计获得了价值大约为 135 000 镑的修道院土地,² 这些土地为王室带来大量收益,增加了王室可支配收入。为了筹措战争费用,亨利八世及其以后的国王,大量出售王室领地,王室可支配收入开始呈下降趋势。

宫廷饮食和服饰消费与王室可支配收入变化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宫廷消费受王室可支配性收入制约的结果。在近代社会以前,限制国王及王室消费的观念,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但均难以实行。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国王的特殊身份,很难区分以其为核心的王室消费和公共消费。公私不分就为国王借公共利益之名,谋求个人私利提供了契机,因而限制国王及王室消费非常困难。对都铎宫廷消费加以制约,既需要观念约束,更需要强有力的机构进行监督。

议会拥有征税审批权是都铎君主遵守国王自理传统的重要原因。国王征税前,须向议会陈述理由、并公布王室支出情况,以便议会了解王室财政困难程度,然后议会再讨论是否批准征税、并确定征税数额,限定税收用途。这一征税程序有利于从制度上约束宫廷消费。

首先,国王征税需要议会授权,从源头上遏制了宫廷的过度消费。英格兰的代议机构享有赋税授予权由来已久,都铎君主为增加自己的收入,曾多次绕过议会征税,试图摆脱议会的控制,但他们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仅仅征收了几次善行捐 (Benevolence) 和强行贷款 (Forced Loan) 等变相的税收,³ 没有建立起独立于议会的长效征税体制,最终返回依靠议会授权征税的原有体制上。议会不仅享有征税赋予权,还限定征税数额。即使议会同意国王征税,在数额上也是“锱铢必较,国王总是难以如意”。⁴ 1512 年,国王要求征税 600 000 镑,但最后议会只授予了 127 000 镑。⁵ 在 1523 年的议会上,国王要求议会授予 800 000 镑补助金,但议会只授予了 152 000 镑,只有国王希望得到的 1/4。⁶ 征收税量不多于用税实际,这样既减少了国王将税款挪作它用的机会,又迫使国王再次征税,从而便于议会对国王施加进一步的影响。议会授权征税制约都铎君主,使他们不能任意侵夺社会财富用于宫廷消费。

其次,议会拥有征税权便于议会监督税款的去向,限制国王将税款挪作它用。议会经常要求国王公开税收开支情况作为批准新税的条件,并限定税收用途。1489 年,王室以支付 10 000 名勃艮底弓箭手的费用为理由,向议会提出征收 100 000 镑请求,但议会只授予了 75 000 镑,并且“坚持要求这笔款项用于特殊的用途。如果战争的需求低于 100 000 镑,授予的数目也相应减少,相反就增加授予数目。议会

¹ B. P. Wolffe, *The Crown Lands 1461 - 1539: An Aspect of Yorkist and Early Tudor Govern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0, p. 48; Penry Williams *The Tudor Regim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8; J. R. Lander,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England 1450 - 1509*, p. 85.

² 关于亨利八世从修道院获得的财富数量有不同说法。威尔·艾尔森认为亨利八世国王获得了 120 000 镑的年收入。盖伊认为 1536 年亨利八世死时,共获得 130 万镑宗教产业收入。详见 Weir Alison, *Henry VIII and His Court*, p. 385; 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7.

³ 善行捐是国王强迫富有臣民变相缴纳赋税的一种形式。爱德华四世是善行捐的始创者。但臣民对这种不经议会批准就征收的变相税收非常不满。民众的反抗曾迫使爱德华四世几次放弃征收善行捐。理查德三世时期,议会明确宣布善行捐违法。都铎王朝虽然恢复了这项敛财方式,但君主们一般只在战争期间才征收。亨利七世在 1491 年借口战争,利用此方式筹款 48 000 镑。1525 年亨利八世计划征收“友好的捐助”(Amicable Grant),遭到全国反对而未果。这次征收失败给都铎君主很大震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敢再尝试此方法。第三次对法战争期间,亨利八世在 1545 年曾征收一次善行捐,获得 119 518 镑的收入。1546 年,他尝试第二次征收善行捐,但以失败告终。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敛财的方式。

强行贷款是指国王面临财政困难时,向臣民强行举借债款。亨利七世统治初期,曾采取此种方式解决财政危机。在财政好转后,他基本偿还了借款。而亨利八世没有归还大多数的借款,使借款成为变相的赋税。第一次英法战争期间,亨利八世通过强行贷款,筹款 352 231 镑。1542 年,他又通过此方式获得了 112 229 镑。亨利八世的行径遭到议会强烈的反对。1544 年的强行贷款因民众的反对,遭到失败。参见 Alexander Grant, *Henry VII: The Importance of His Reign in English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43; Frederick C.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458 - 1649*, p. 166, 94, 165.

⁴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1 页。

⁵ Richard Britnell, *The Closing of Middle Ages*, p. 112.

⁶ Richard Britnell, *The Closing of Middle Ages*, p. 112; John Guy, *Tudor England*, p. 99.

还要求特设一个专门机构保存这笔款项,只允许国王需要时提取,现金和账目都不上缴财务署和任何王室内部机构”。¹ 议会监督税款用途也是制约宫廷过度消费的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都铎王朝时期,议会享有批准国王征收赋税的权力和税收一事一议的征收方式,使宫廷消费受到客观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受限的炫耀式消费充分表明了都铎王权的有限性。

责任编辑:张乃和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Tudor Court

ZHANG Dian-qing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Diet and clothing in Tudor court not only preserved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f royal court but also embodied the monarchs' power. For this reason, the monarchs made great exertion to maintai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way of luxurious diet and clothing. However, such non-productive consumption in the court was curbed by the monarchs' limited wealth due to the parliament's restriction of king's levying taxes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at the king shall live of his own. The restricte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demonstrates the limited royal power.

Key words Tudor court; diet consumption; clothing consumpti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上接第 67页)

A Comparison of Thought of Transforming the Ruling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16th to 19th Century

TIAN Yi-p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ountries' invasion of Orient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ern countries from 16th to 19th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discussed deeply on the issues about the ruling order and ruling system. Japanese elite took the lead in querying the shogunate-domain system, and disputed fiercely around issue of system conver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people who advocated reforming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China. As far as changing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Japan took the form of "Restoration", instead of imitating simply Western "Democracy", and established the Tenno absolutist regime, which means transformation from pure feudal style of government to the final political form of feudalism, namely autocracy. In the same period, the movement for reforming the ruling system in China started later and took on radical development momentum. The revolution rose rapidly after the moderate political reformation failed in late 19th century and caused the overthrow of Qing Dynasty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Republic in Asia. In shor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ought of reforming ruling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ich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nation state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resulted in different road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ling system; transformation; nation state

¹ R.W. Hoyle Crown "Parliament and Tax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ER*, 1994 Nov., p. 1177. S.B. Chrines *Henry VII*, p. 201.